

社会建构还是资源动员?

——社团卷入与人际关系影响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网络机制研究

吴结兵¹ 沈台凤² 宋程成¹

(1. 浙江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杭州 310058; 2. 香港科技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香港)

[摘要] 中国的社团组织和人际关系一直以来都被认为与西方社会存在显著差异,在独特的制度、文化及组织情境性下,我国社团组织和人际关系对公民政治参与的影响及其网络机制是否具有独特的情境效应? 基于 CGSS 2005 城乡居民样本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社团卷入对我国公民制度化和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都有显著正向的影响,在公民政治参与中主要发挥了一般普遍性的社会建构作用;而人际网络对公民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反向作用于公民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在公民政治参与中发挥了独特的资源动员作用。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在对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影响中,社团卷入与人际关系具有相互增强的交互作用,这拓展了现有研究中人际网络依赖于组织网络的调节机制模型。

[关键词] 社团卷入; 人际关系; 政治参与; 中国情境; 网络机制

Social Construction or Political Mobilization? The Influence of Organizational Involvement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o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China

Wu Jiebing¹ Shen Taifeng² Song Chengcheng¹

(1.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2.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ong Kong, China)

Abstract: Building on previous scholarship which has highlighted unique features of Chinese NGOs (often referred to as GONGOs) and social relationships (called *Guanxi*), we wonder whether the influence of organizational and interpersonal networks on Chines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s also distinct from the West. In other words,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social networks affect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China and test the context-effects of such influences.

[收稿日期] 2015-02-04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 <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

[在线优先出版日期] 2015-08-28

[网络连续型出版物号] CN33-6000/C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3&ZD04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173183);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2BZZ045); 浙江大学社科学部2013年自主科研项目

[作者简介] 1. 吴结兵(<http://orcid.org/0000-0002-3890-9995>),男,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管理学博士,主要从事社会网络与社会组织研究; 2. 沈台凤(<http://orcid.org/0000-0001-5530-5707>),女,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社会组织研究; 3. 宋程成(<http://orcid.org/0000-0001-6228-3972>),男,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社会组织研究。

In China, there are different forms of recognize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some of which are encouraged by the government, such as grassroots-level voting, some are discouraged, such as petitioning. Through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of organizational involvement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on different forms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his research project identifies both social construction and political mobilization as causal mechanisms. The findings based on CGSS 2005 survey data indicate that organizational involvement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both voting and petitioning participation. Such high coherence indicates that organizational involvement fosters individual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which confirms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effect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coincides with findings from other countries.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China are less effective in constraining individual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han they are intended to be. Thus, besides focusing on the debates about whether Chinese social organizations are best understood through the respective lenses of civil society or state corporatism, it seems that we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further consequences of personal involvement in social organizations.

Furthermore, we also find that interpersonal networks positively affect grassroots-level voting (encouraged by the government) but negatively affect petitioning participation (discouraged by the government), which implies that interpersonal networks serve as channels of political mobilization for state interests. As China turned from a totalitarian society to a more plural society, social control of the state lessened significantly. Thus, there was also less direct control over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in order to maintain a low-cost political mobilization system, local officials had to us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to achieve policy objectives. Compared to Western societies, China's interpersonal network resources are generally seen as particularly rich, which makes them an effective tool in political mobilization. Taking this particular social context into account provides for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ausal effects of both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within organizational networks as well as political mobilization through interpersonal networks on Chines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Moreover, in this research we find a significant reinforcement interaction effect of organizational involvement and interpersonal networks on participation in elections. Building on the existing research on the interaction effect of multiple networks, which generally posits that the influence of interpersonal networks depends on organizational membership, our study goes a step further and offers a model of two separate networks and a more universally applicable interaction model of multiple networks concerning individual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summary,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extend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main effects and underlying mechanisms of social networks o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the Chinese context. While offering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is research also makes a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to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heory by introducing context effects of social networks.

Key words: organizational involvement;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Chinese context; network mechanism

一、引言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在西方政治参与研究的文献中,社会网络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引起了

广泛关注,这方面的研究进展让我们看到,在传统的经济社会地位因素之外,公民的政治参与还受到了个体所嵌入的社会关系的影响^[1-2]。这种社会关系本质上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团体身份归属所形成的正式社团网络^①,另一种是以情谊联系所形成的非正式的人际网络^[3]。相关研究表明,作为社会互动的场域,网络既是个体获得资源的重要渠道^[4],又反映了个体思想观念的社会构建过程,在资源动员和社会建构两方面影响个体的政治参与行为^[5-6]。

应该说,无论是对政治资源的组织动员,还是政治观念的社会构建,情境性在网络作用机制的研究中都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重要因素^[7],不同的社会体制和文化背景下,资源动员的方式和社会观念都可能存在较大差异,网络对公民的政治参与也就可能产生不同的影响。然而迄今为止,对公民政治参与网络作用机制的实证研究主要是在社团发展相对成熟、社会自治程度较高、公民参与型文化占主导的西方社会情境中展开的,现有研究很少讨论政治参与的网络机制在其他不同的社会情境、不同的制度和文化背景下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就中国情境而言,中国的社团组织和人际关系一直以来都被认为与西方社会存在显著差异。从中国社团的官民二重性和传统文化出发,很多学者认为,中国的社团和人际网络都可能抑制公民的政治参与动机^[8-10];而另外一些研究从我国社团的国家法团主义性质推断,国家在公民政治参与中强大的动员力量使国家可以通过政治动员来推动公民的政治参与^[11]。然而这些分歧的理论观点都缺少经验证据的支持,很少有研究在操作层面实证检验我国社团网络和人际关系在公民政治参与中扮演的角色,由此产生的问题是:中国情境下的组织与人际关系对公民的政治参与行为到底具有怎样的影响?这些影响又是通过什么样的机制在发挥作用?这些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是否呈现出与西方情境下不一样的作用规律?

针对这些问题,本文考察社团卷入(organizational involvement)和人际关系对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影响,并通过比较这两种因素在公民制度化和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中的不同作用来辨析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内在网络机制,基于 CGSS 2005 城乡居民样本,本研究对所提出的理论假设进行了实证检验。本文试图评估在社会建构和资源动员之间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网络作用机制,以拓展对我国公民政治参与行为的理解,同时审视相关的制度、文化及组织情境在公民政治参与网络机制中所扮演的角色,深化对中国情境下公民政治参与规律的研究。

二、理论与假设

(一) 社团卷入与政治参与

作为公民个体加入社团或参与社团活动的行为,社团卷入刻画了个体因身份归属或团体活动而形成的正式网络^[3,12]。基于社会化的观点,政治参与被视为一种社会认同的过程,人们参加一定的政治活动是因为他们的某些观念和价值与这些政治主题接近,这些观念和价值只有在社会关系中才得以形成和塑造^[13-14]。社会网络尤其是正式的组织网络,通过符号、仪式、叙述在互动中表达意义,建立和巩固个体的社会身份并塑造个体的认知框架,从而使他们感知、解释和参与社会实践^[15]。特别是社团公共组织的性质,使社团在培养公民政治兴趣及社会和政治意识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这使得个体在思想观念上与特定政治议题相近,从而建立起个体和政治活动之间的联系^[13,16]。在这个意义上,社团被称为“民主的学校”^[17],为个体政治参与提供了意义阐释的社会背景,使社团成员具有更为强烈的政治意识,主观上有更加强大的公民行为能力,从而推动公民参与

① 与狭义上“社团”概念——相对于基金会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而言的“社会团体”——含义不同,本文是从广义上使用“社团组织”这一概念,具体是指除政府、企业单位外的社会中间组织,与“第三部门”、“社会组织”的含义一致。

政治活动^[18]。

具体来看,社团的社会建构功能培育了公民政治参与的观念和意识,能够促进公民进行不同类型的政治参与。在制度化的政治参与中,帕特南对意大利不同地区的观察表明,地区社团的发展与投票率之间呈现紧密的正相关关系^[18]。而在公民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中,社团社会建构的功能体现得更为明显。McAdam指出,相对于低风险、低成本的制度化政治参与,高成本、高风险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决策更加依赖思想观念上的支持^[19]。这一点在西方社会运动的研究中得到了广泛证实,例如美国民权运动中黑人教堂的作用^[20-21],以及伯克利言论自由运动中高校社团的支持^[22],这些社会运动都是从社团的集体认同感中找到了最初的动力。

有关社团在公民政治参与中作用的另一个解释来自资源动员理论。这一理论范式从个体的理性选择出发,指出政治参与是一种目标导向行为,人们参加政治活动是由于人们能够获得和利用一定的资源来支持其政治参与行为^[16],这些资源既包括有形的资金、场所、设施、成员,也包括无形的意识形态、组织技能、合法性支持等。社团是资源组织化的载体,在组织层面构成了政治参与的动员结构,参加社团有利于个体获得政治参与的必要资源^[23],推动公民参与到政治活动中来^[4],大量研究证实社团在招募公民参与政治活动方面发挥了突出作用^[19,24]。

相对于资源动员理论强调社团层面的组织动员,从中国社团出发的研究强调了国家在资源动员中所扮演的角色,即自上而下的国家政治动员。与西方相对独立的社团组织不同,不少学者注意到,中国社团大多带有明显的官民二重性特征,大部分中国社团由政府创建,对国家有着明显的资源依赖,其利益被整合到政府体系中,行为受到政府的引导、管理与控制^[9,25],在实践中形成了国家与社团之间协作一致的国家法团主义的结构^[11]。一些学者据此认为,我国社团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中扮演了“行政渠道”的作用^[26],如在基层选举等制度性政治活动中扮演组织动员者的角色^[27-28]。而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因为可能超越法律的框架而极易使参与者处于与政府对立和冲突的境地,理性的政府会通过分析这些活动对自身的威胁大小,通过对资源的控制来抑制体制外的政治活动,如对社团进行监管、禁止甚至取缔来降低公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可能性^[8,29]。

概而言之,对于制度化政治参与,虽然社会建构和资源动员理论从不同视角给出了不同的解释,但都认为社团对公民的政治参与具有正向的影响。对此,本文提出假设1:

H1: 社团卷入程度越高,公民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可能性越大。

对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社会建构与资源动员理论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社会建构理论认为社团会培育公民政治参与的意识,从而推动公民参与非制度化政治活动;而从中国社团的政府依赖性出发,资源动员理论认为国家会通过通过对社团的资源控制和行为监管来减少公民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对此,我们提出相对立的两个假设以进一步检验和辨析社团对公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影响及其网络机制:

H2a(社会建构机制假设): 社团卷入程度越高,公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可能性越大。

H2b(资源动员机制假设): 社团卷入程度越高,公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可能性越小。

(二) 人际关系网络与政治参与

政治参与的社会建构不仅发生在组织内部,也发生在日常的社会交换中。正如克兰德尔曼斯指出的,社会建构是由那些身处沟通与合作过程之中的个人创造出来的,“在酒吧的对话里,在聚会中,在会议室里,在火车的车厢里,以及在今日的世界里,通过电话、传真或电子邮件创造出来”^[30]。在由亲戚、朋友和熟人组成的人际生活圈子里,所发生的事情和新的信息被讨论、阐释和评判,这种人际间的沟通和合作是意义建构的过程,也塑造着个体的政治观念和参与意识^[31-32]。

人际网络中公民政治观念的社会建构体现了社会文化嵌入性的影响。作为社会关系中的共享价值观^[33],社会文化构成了个体行为的“意义之网”,并在面对面的人际网络中具体化,通过人际互动,社会文化与个体意识及政治行为联系在一起。正如托克维尔对美国民主制度的考察以及阿尔蒙德和维巴对多国政治文化的研究所揭示的,一个国家的文化风俗和公民传统塑造着国民公共参与的意识,对公民政治参与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17,34]。

在对中国政治文化的研究中,一些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王权至上的政治原则、长幼尊卑的人伦关系,以及强调安定、统一、秩序的政治思想,使传统社会形成了一种普遍的依附关系和被动心态,造成民众相对弱化的政治自主意识和消极的政治参与意识^[10,34]。特别是对于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而言,社会上的大多数人都倾向于把发生于体制外的集体行为看作是非正常行为^[1]。因此,有研究推断,传统文化及其这种文化中衍生出的社会关系会抑制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行为,尤其是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行为^[35-36]。

不同于社会建构理论从社会观念角度的解释,资源动员理论是从个体的理性选择出发,认为人际网络影响公民政治参与行为是由于人际网络能激励个体的政治参与行为。就像弗里德曼和麦克亚当指出的,拒绝对网络中同伴的召唤做出回应意味着可能失去这一社会关系可能提供的收益,这种收益可能是社会性的,如友谊或社会荣誉,也可能是物质性的,如工作机会^[37]。从这个角度来看,人们参与政治活动是因为有来自网络伙伴的邀请或要求,并且在决策中伴随着个体对这种邀请或要求的成本收益计算。

在中国情境中,人际网络中的人情和面子为网络的激励注入了更为丰富的内涵。“讲人情”和“给面子”是中国社会人际交往中重要的社会规范^[38],并且这种非正式的人际准则被广泛运用于正式权力的运作,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半正式或非正式的基层治理体系^[39]。在国家的政治动员中,特别是基层的政治动员中,基层官员将诸如人情、面子等日常生活原则引入,通过非正式的人际关系舍硬求软地实现国家的政策目标。例如一些研究发现,在居委会选举中,基于邻里关系的非正式权力策略的运用明显促进了公民在选举中的参与^[40],而人情、面子、血缘关系更是地方政府应对上访“钉子户”的传统手段^[41],人际网络中的非正式规范会使上访等体制外的行为面临巨大的制度压力。

也就是说,有关人际网络对公民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影响,从中国传统文化出发的社会建构论认为,从相对消极的政治文化中衍生出的社会关系会阻碍公民制度化的政治参与;而资源动员论认为,基于人际关系的政治动员会推动公民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对此,我们提出相反的两个假设以检验人际网络在公民政治参与中的作用机制:

H3a(社会建构机制假设):人际网络越紧密,公民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可能性越小。

H3b(资源动员机制假设):人际网络越紧密,公民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可能性越大。

而对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社会建构理论和资源动员理论分别从社会观念和国家干预的视角,一致倾向于认为中国情境下的人际网络会阻碍公民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对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4:

H4:人际网络越紧密,公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可能性越小。

三、数据与方法

本文分析使用的数据来自 2005 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2005)。CGSS 2005 是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方法,对全国城镇和农村地区(除西藏和港澳台地区)的 18 岁以上人口实施的一项全国性大规模入户调查。本研究选取 CGSS 2005 城镇和农村居民调查的有效样本数

为9 457个。

研究的因变量为公民的政治参与行为。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最具核心地位的民主形式,人大代表选举投票是制度化程度最高的政治参与形式^[29],因此我们采用公民是否参与地方人大代表选举投票来测度公民制度化政治参与程度,投票情况通过CGSS 2005问卷中“您在上一次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中有没有投过票”这一题项获得,结果采用“有”或“没有”来衡量。另外,我们采用公民是否参加了上访请愿活动来测度公民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程度。虽然《信访条例》及相关的法令法规都规定了到政府部门上访请愿是公民的一项权利,但现实中的公民上访受到了许多限制,面临“合法性的困境”^[41-42],而请愿则是更为激烈的一种抗争维权方式^[29],两者都符合非制度化政治参与高成本、高风险的典型特征。公民参加上访请愿的情况通过CGSS 2005问卷中“您有没有参加过上访请愿活动”这一题项获得,结果采用“有”或“没有”来衡量。

研究的自变量为组织卷入和人际关系。对社团卷入的测量由“在业余时间里,您有没有在以下方面参加由您工作单位以外的社团组织安排/进行的活动”这一题项获得,按照社团活动的不同类型,问卷中这一题项包括了7个子项(健身/体育活动、娱乐/文艺活动、同学/同乡/同行联谊活动、宗教信仰活动、有助于增进培养/教育子女能力的活动、有助于提高个人技能/技术的活动、公益/义务活动)。我们采用这7个子项的参与频率(Likert 5级量表)来衡量公民个体的社团卷入程度,通过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公因子,得到社团卷入因子(Conbrach's α 系数为0.718)。

人际关系综合采用了亲戚朋友、邻里关系的紧密程度,测度通过“亲戚/朋友之间的接触和联系的密切程度”、“您和邻居、街坊/同村其他居民互相之间的熟悉程度”以及“您与您的邻居、街坊/同村其他居民之间有互助行为”三个题项来测量(Likert 5级量表),通过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公因子,得到人际关系因子(Conbrach's α 系数0.614)。

本研究控制了影响公民选举投票的一些人口和社会统计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年龄平方、教育程度、党员身份、个人收入、婚姻状况、工作状况等^[43]。其中,对性别、教育程度、党员身份、工作状况、婚姻状况这些变量的控制变量,本研究设置为虚拟变量,参照项分别表示男性、大学、党员、在职和已婚。

研究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Pearson相关系数如表1所示。由于因变量为二分类变量,本研究使用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采用SPSS 16.0软件包对数据进行处理与分析。

四、实证研究结果

表2显示了假设检验的结果。其中,模型1和模型4分别检验了各控制变量对公民参与人大代表选举投票和上访请愿的影响。模型1结果表明,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工作状况、婚姻状况和政党身份对公民是否参与人大代表选举投票均具有显著影响,其中男性、中年、受过高等教育、在职、已婚、党员更倾向于参与人大代表选举投票,这与其他有关选举的研究结论相一致^[29,44];模型4结果表明,公民上访请愿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并不明显,仅受教育程度有一定的影响($p \leq 0.1$),相对于受过大学教育的个体,仅受过小学或中学教育的公民不太可能参与上访请愿,这与于建嵘观察得到的维权农民特征一致^[45]。

表 1 本研究使用变量的均值、标准差与 Pearson 相关系数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性别	0.488	0.500											
年龄	44.844	14.654	0.051***										
年龄平方/100	22.257	14.083	0.055***	0.985***									
工作情况	0.717	0.451	0.096***	-0.359***	-0.387***								
婚姻状况	0.851	0.356	-0.034***	0.167***	0.090***	0.082***							
党员身份	0.114	0.317	0.186***	0.185***	0.185***	-0.090***	0.060***						
教育程度	2.075	1.001	0.114***	-0.294***	-0.281***	-0.035***	-0.118***	0.211***					
个人收入	8.561	1.112	0.183***	-0.118***	-0.113***	-0.088***	-0.027***	0.180***	0.542***				
社团卷入	0	1	0.031***	-0.144***	-0.127***	-0.078***	-0.119***	0.126***	0.418***	0.373***			
人际关系	0	1	-0.005	0.059***	0.039***	0.149***	0.141***	0.004	-0.227***	-0.253***	-0.134***		
选举投票	0.350	0.477	0.087***	0.112***	0.093***	0.051***	0.081***	0.154***	0.045***	0.046***	0.070***	0.098***	
上访情愿	0.011	0.102	0.014	0.035***	0.033***	-0.028**	0.011	0.016	0.014	0.009	0.056**	-0.031***	0.010

注: *表示 $p \leq 0.05$, **表示 $p \leq 0.01$, ***表示 $p \leq 0.001$, 为双尾检验。

表2 影响政治参与的二项 Logistic 回归分析

控制变量	人大代表选举投票			上访请愿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性别	-0.180*** (0.047)	-0.191*** (0.047)	-0.196*** (0.047)	-0.254 (0.215)	-0.312 (0.216)	-0.319 (0.216)
年龄	0.097*** (0.010)	0.097*** (0.010)	0.096*** (0.010)	0.073 (0.047)	0.090 ⁺ (0.048)	0.090 ⁺ (0.048)
年龄平方/100	-0.078*** (0.011)	-0.078*** (0.011)	-0.077*** (0.011)	-0.054 (0.047)	-0.067 (0.047)	-0.067 (0.047)
小学	-0.375*** (0.094)	-0.296** (0.098)	-0.299** (0.098)	-0.669 ⁺ (0.394)	-0.159 (0.413)	-0.158 (0.413)
中学	-0.208* (0.087)	-0.147 (0.090)	-0.159 ⁺ (0.090)	-0.700 ⁺ (0.371)	-0.259 (0.385)	-0.267 (0.384)
高中	-0.103 (0.085)	-0.056 (0.087)	-0.073 (0.087)	-0.279 (0.346)	-0.008 (0.353)	-0.018 (0.352)
工作状况	-0.489*** (0.059)	-0.458*** (0.059)	-0.476*** (0.060)	0.373 (0.246)	0.222 (0.247)	0.214 (0.247)
婚姻状况	-0.134 ⁺ (0.073)	-0.111 (0.074)	-0.110 (0.074)	-0.209 (0.344)	-0.343 (0.350)	-0.341 (0.349)
个人年收入	0.031 (0.024)	0.031 (0.025)	0.028 (0.025)	-0.036 (0.113)	-0.196 ⁺ (0.114)	-0.200 ⁺ (0.114)
政党身份	-0.716*** (0.072)	-0.665*** (0.072)	-0.665*** (0.073)	0.029 (0.300)	0.044 (0.305)	0.045 (0.305)
自变量						
社团卷入		0.173*** (0.025)	0.187*** (0.026)	0.442*** (0.081)		0.459*** (0.084)
人际关系		0.203*** (0.024)	0.204*** (0.024)	-0.310** (0.107)		-0.330** (0.111)
社团卷入 * 人际关系			0.100*** (0.024)			0.049 (0.072)
常数项	-2.411*** (0.350)	-2.549*** (0.354)	-2.481*** (0.355)	-5.888*** (1.628)	-5.425*** (1.615)	-5.388*** (1.616)
样本量	945 7	945 7	945 7	945 7	945 7	945 7
参考决定 系数 R ²	0.075	0.091	0.094	0.021	0.052	0.053

续表 2

控制变量	人大代表选举投票			上访请愿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Chi-square	526.839*** (10)	646.988*** (12)	664.855*** (13)	21.957* (10)	54.291*** (12)	54.746*** (13)
-2 Log likelihood	11 716.550 (4)	11 596.402 (4)	11 578.535 (4)	1 077.762 (8)	1 045.429 (8)	1 044.974 (8)

说明: + 表示 $p \leq 0.1$, * 表示 $p \leq 0.05$, ** 表示 $p \leq 0.01$, *** 表示 $p \leq 0.001$ 。

模型 2 和模型 5 检验了社团卷入和人际关系分别对选举和上访请愿的影响。模型 2 的结果表明,社团卷入对公民是否参与人大代表选举投票有显著正向的影响($p \leq 0.001$),这证实了假设 1。同时,人际关系对公民参与人大代表选举投票也具有显著正向的影响($p \leq 0.001$),这证实了假设 3b,否定了假设 3a。假设 3a 从网络的社会建构功能出发,推断从传统文化中衍生出的社会关系不利于公民制度化的政治参与,而假设 3b 从国家动员的角度推测,国家通过非正式化的权力策略能够有效动员公民参与制度化的政治活动。人际关系的正向作用表明,对我国公民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影响中,人际关系更多的是发挥了资源动员的作用,而不是社会建构的功能。这印证了桂勇在居委会选举研究中的发现,即基于人际关系的非正式权力策略的运用促进了公民参与选举^[40]。

模型 5 分别检验了假设 2a、假设 2b 和假设 4。结果表明,社团卷入对公民是否参与上访请愿具有显著正向的影响($p \leq 0.001$),而人际网络对公民是否参与上访请愿具有显著负向的影响($p \leq 0.01$),这一结果证实了假设 2a 和假设 4,否定了假设 2b。假设 2a 基于社会建构理论推测社团卷入对公民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具有正向影响,而假设 2b 从资源动员理论出发,推测国家会通过通过对社团的监管来减少公民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社团卷入对上访请愿的正向影响表明,在我国公民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中,社团网络更多的是发挥了社会建构的功能,而不是资源动员的作用。这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托马斯·海贝勒对我国社会发育进程的一个基本判断,即国家监管下的社团发展会通过增强的公民意识和扩大的公民参与来推动社会转型^[46]。

在模型 3 和模型 6 中,我们还分别探索性地考察了社团卷入和人际网络在影响公民选举投票和上访请愿中的交互效应。在模型 3 中,社团卷入和人际关系交互项的回归结果表明,对于公民是否参与人大代表选举投票,社团卷入与人际关系具有相互增强的交互作用。这一结果意味着,对促进公民制度化的政治参与,社团网络的社会建构机制和人际网络的资源动员机制能够起到互补作用。如果个体在社团参与中培育了政治参与的观念和意识,同时又处在人际网络的动员中,会增强其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倾向性,促进其制度化的政治参与行为。

模型 6 的结果表明,社团卷入和人际关系交互项对于公民是否参与上访请愿没有显著影响。考虑到模型 5 中社团卷入对上访请愿的正向影响和人际关系对上访请愿的负向作用,以及政治参与决策中的交叉压力(cross-pressures)^[47],我们推测社团卷入与人际关系对公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具有相互干扰的交互效应,但这一推测没有得到验证。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这两者的相互干扰效应依赖于个体所处社团网络和人际网络的重叠程度。理论上,越是重叠的二重网络,越不可能相互干扰,完全重叠一致的网络之间不可能存在相互替代的效应。因此,我们的猜想是我国公民的社团和人际网络具有较高程度的重叠,导致社团卷入和人际关系交互影响公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变得不显著。

五、讨 论

本文探讨了中国情境下社团和人际网络对公民政治参与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基于 CGSS

2005 的统计样本,我们对提出的理论假设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就社团卷入在公民政治参与中的影响而言,社团卷入不仅促进了公民制度化的政治参与,也推动了公民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从国家政策导向来看,国家在公民政治参与上的动员目标是“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①。换言之,国家的动员目标是尽可能扩大公民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同时减少公民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从社团卷入在公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中起到的正向作用可以看出,社团在国家对公民政治参与的动员中并没有发挥“行政渠道”的作用,没有抑制反而促进了公民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同时,社团卷入对制度化和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影响的一致性表明,在公民政治参与中社团发挥了社会建构的作用,社团背景下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促进了公民思想观念上的变化,培育了公民政治参与的意识,因而能同时正向影响公民制度化和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行为。

从人际关系对公民政治参与的影响来看,人际关系促进了公民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同时抑制了公民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这种影响方向上的不一致表明,人际网络影响公民政治参与的机制并不是通过社会观念的构建。虽然很多研究强调人际关系作为“意义之网”的作用,并推测从中国传统文化中衍生出的社会关系会阻碍公民的政治参与,但在制度化的政治参与中我们并没有看到人际关系带来的这种负向作用,反而是人际关系正向影响了公民的制度化政治参与。同时人际关系负向影响公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而这恰恰符合国家动员的政策目标,即扩大制度化政治参与、减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事实上,人际网络中制度压力和资源激励对个体行为的影响为外部干预公民政治参与提供了可能,磨不开的面子以及政府官员掌握的行政资源,通过亲戚、朋友、邻里等人际网络扩散,通过这种非正式的方式来实现国家在政治动员上的目标,这使得人际网络越紧密的个体更多地进行投票这种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更少地进行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

总的来说,我们发现社团的社会建构机制以及人际关系的资源动员机制在我国公民政治参与中具有突出作用,这一结论凸显了中国情境下政治参与网络机制的一般性和特殊性。就社团对公民政治参与的影响而言,本研究的结论与其他情境下的研究结论具有高度一致性,如托克维尔对美国社团的观察^[17]和帕特南对意大利不同地区公民参与的研究^[18]。虽然许多研究指出了我国社团官民二重性的特征,一些研究据此推断国家在社团控制上对公民非制度化参与行为的监管策略^[8],但本研究结果并没有支持有关中国情境特殊性的论断。从总体上看,社团卷入对非制度化参与的正向影响反映出宏观层面的社会管理体制并没有转换为对个体政治参与的制约^[48],在国家动员力量和社会发育机制之间,国家的逻辑并不必然主导社会发展进程^[49]。因此,对公民的政治参与而言,不应该夸大国家对社团的管理和控制作用,更不应该否定我国社团发展对促进公民参与意识的积极作用。

就人际网络对公民政治参与的影响而言,我们发现中国情境下人际关系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独特性的一面。我国人际关系对公民政治参与的影响既不是基于社会文化的社会建构功能,也有别于西方情境下政治参与的微观动员,而是反映出国家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过程,这种基于人际的政治动员反映出中国社会非正式或半正式治理的特征^[39]。也就是说,为落实国家政治动员的目标,政府官员采取了非制度化、非正式的权力策略^[40],将人情、面子引入正式权力的行使过程,通过人际关系网络来保障国家政治动员目标的实现,在社会治理领域,这被认为是一种低成本、实用主义的治理模式^[50-51]。

从情境性出发,公民政治参与的社会网络机制深刻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与社会关系转型的宏大背景。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我国由总体性社会向多元社会的转变,在组织层面,国家正逐步退出对社会的控制,国家掌握的资源特别是组织资源大为下降^[39];在意识形态领域,国家面临着制度化权威资源的缺乏与有效控制手段的不足的困境^[40]。社团的蓬勃发展既是

^① 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报告中都明确提出要“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并将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作为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重要内容。

利益多元化发展的结果,又为思想观念的多元化提供了组织基础,培育了公民政治参与的意识。而在体制内,为了低成本地维持国家的动员体系,基层官员不得不运用人情、面子等本土化资源,通过人际关系等非正式的方式来实现政策目标。相较于西方,中国人际网络中的资源更丰富^[3],更适合作为资源动员的工具。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在公民政治参与中社团的社会建构机制和人际关系的资源动员机制。

除了深化对公民政治参与网络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的理解,本研究对于增进社会稳定、改进社会治理方式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亨廷顿指出,扩大化的政治参与是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但政治参与的扩大化往往容易超过体制的承载能力,从而带来社会动荡,因此在政治现代化进程中,政府必须有能力制衡政治参与扩大化和政治制度化,将现代化造就的新兴社会力量及其利益表达纳入体制的范围内^[52]。因此,促进公民制度化政治参与对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在此方面,社团和人际网络都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并且社团和人际网络相互增强,共同促进了公民在体制内有序的政治表达,这体现了参与扩大化与政治制度化之间的平衡。因此,在我国政治现代化进程中,必须重视社团发展和人际网络在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中的积极作用,通过促进社团发展及加强社会文化和人际关系的建设,促进公民多元利益的表达与社会的和谐稳定。

在公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方面,我们看到,在社团组织背景下公民政治意识的社会构建既促进了公民在体制内的利益表达,也推动了公民体制外的政治参与,虽然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不一定意味着社会的不稳定,但显然国家对社团的严格监管并没有转化为对公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有效治理。在此方面,人际网络虽然能够弥补国家在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中有效的组织控制手段的不足,但这种非正式化治理中的特殊主义、义务和权利的互惠条件及灵活变通的特征^[53],使得基于人际关系的治理与现代社会建立在普遍主义、正式规则和法制基础上的制度化治理还相距甚远,对于中国社会发展而言,如何实现组织化、制度化的治理仍是一个需要探索的命题。

六、结论与展望

人类的行动嵌入在一定的社会网络之中^[54],网络为个体行为提供信仰、灌输意识,并结构性地形塑人们的行动,促进或限制他们的选择。同时,以个体为中心的网络嵌入在更高层面的社会制度和文化背景中,网络对个体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会因不同的社会情境而呈现出差异^[7]。针对公民政治参与中的不同网络机制,本文考察了中国情境下社团和人际网络对我国公民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基于网络在制度化和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中不同作用的比较分析,本文深入辨析了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网络作用机制,并通过 CGSS 2005 的城乡居民样本对理论假设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社团卷入对公民制度化和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都有显著正向的影响,在公民政治参与中主要发挥了社会建构的作用,培育了公民政治参与意识;(2)人际网络对公民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反向作用于公民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在公民政治参与中主要发挥了资源动员的作用,体现了国家权力的非正式运用;(3)在对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影响中,社团卷入与人际关系具有相互增强的交互作用,共同促进了公民制度化的政治参与行为。

以往研究在公民政治参与的网络机制方面做了很多有价值的探讨,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本文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我们从社会建构和资源动员机制两个方面对西方情境下社会网络与政治参与的相关研究以及中国情境下的理论推断进行了归纳总结,并基于全国性的大样本数据对不同理论观点进行了实证检验,证实了我国社团的社会建构机制以及人际关系的资源动员机制。这有助于弥合现有理论观点在此方面的分歧,有助于深化对我国公民政治参与行为的认识,同时从公民政治参与这一

视角拓展了对我国社团发展及社会治理的认识。

第二,与西方情境下探讨社会网络对公民政治参与影响的研究不同,本研究考察了中国社会和组织背景下社团卷入和人际关系对公民政治参与的影响。我们发现,中国背景下社团卷入对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有着显著正向的影响,但人际关系对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具有显著负向作用。也就是说,不同网络的情境敏感是不一样的,社团卷入在中西方情境下的影响是一致的,但人际关系在不同情境下有着不同影响。这表明,情境的差异性不一定是情境的独特性,网络机制需要置于具体情境中分析,这拓展了我们对情境性在网络机制中的作用的理解,对补充和完善政治参与理论以及这些理论在不同情境中的应用具有重要价值。

第三,虽然一些研究意图考察组织和人际网络对公民政治参与的交互作用^[13,55],但它们将人际关系置于特定组织背景下来分析人际关系如何影响了个体的政治参与行为。这些研究隐含着一个假设,即人际网络对公民政治参与的影响依赖于组织的性质和成员身份^[4]。虽然组织是人际关系的重要生成场域,但正式的组织关系与非正式的人际关系并非总是完全重叠的,作为关系组合,个体的社团网络与人际网络完全可能是交叉甚至分离的。对此,本文考察了不依赖于个体组织身份的二重网络情形,发现组织和人际网络对公民的制度化政治参与有相互增强的交互效应,这拓展了人际网络依赖于组织网络的调节机制模型,为政治参与理论提供了一个更具适用性的二重网络交互作用模型。

对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网络机制的研究,本文仅仅只是探索的一个开始,还存在许多不足。首先,社会构建和资源动员的网络机制之间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同一社会现象中可能有多种不同机制同时发挥作用^[1,49],甚至是相互补充、相互关联地发挥作用。本研究通过比较分析网络在制度化和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中的不同作用,在逻辑和经验上论证了公民政治参与中主导性的网络机制,得到我国社团和人际网络在公民政治参与中主要的网络效应,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对社会建构和资源动员构念进行操作化,开展中介机制模型的实证检验,并探索这两种机制之间的作用关系。其次,本文对社团和人际关系的界定是总体性的,考虑到我国社团的“分类控制”特征^[8]以及中国人际关系的“差序格局”^[56],不同类型的社团和不同类型的人际关系对公民政治参与的影响可能存在较大差异,未来研究可以在特定的场域针对特定社团和人际关系类型展开更为具体充分的讨论。最后,就中国情境而言,尤其是对基于人际关系的非正式社会治理体系而言,这种治理模式究竟是一种中国社会稳定持久的秩序还是社会转型时期的特定现象,学界有不同看法^[39,51]。因而对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网络机制的稳定性和一般性,需要置于更长的时间框架中来观察,未来研究可以在不同的时间跨度或通过纵向研究进行进一步检验。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郁建兴教授、王诗宗教授以及浙江大学管理学院郭斌教授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在此一并致谢。)

[参 考 文 献]

- [1] 赵鼎新:《西方社会运动与革命理论发展之述评——站在中国的角度思考》,《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1期,第168-209页。[Zhao Dingxin, "A Critical Review and Analysis of Western Theories of Social Movements and Revolutions: A Chinese Synthesis," *Sociological Research*, No. 1(2005), pp. 168-209.]
- [2] M. T. Heaney & S. D. McClurg, "Social Networks and American Politics: 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Issue," *American Politics Research*, Vol. 37, No. 5(2009), pp. 727-741.
- [3] 边燕杰、郝明松:《二重社会网络及其分布的中英比较》,《社会学研究》2013年第2期,第78-97页。[Bian Yanjie & Hao Mingsong, "Social Networks and Their Distributions: A China-Britain Comparison," *Sociological Research*, No. 2(2013), pp. 78-97.]

- [4] H. E. Brady, S. Verba & K. L. Schlozman, "Beyond SES: A Resource Model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9, No. 2(1995), pp. 271 - 294.
- [5] F. Passy & M. Giugni, "Social Networks and Individual Perceptions: Explaining Differential Participation in Social Movements," *Sociological Forum*, Vol. 16, No. 1(2001), pp. 123 - 153.
- [6] [美]卡洛尔·麦克拉吉·缪勒:《建构社会运动理论》,见[美]艾尔东·莫里斯、卡洛尔·麦克拉吉·缪勒主编:《社会运动理论的前沿领域》,刘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29页。[K. M. Miller, "Construction of Social Movement Theory," in A. D. Morris & K. M. Miller(eds.), *The Frontier of Social Movement Theory*, trans. by Liu Neng,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3 - 29.]
- [7] Z. Xiao & A. S. Tsui, "When Brokers May Not Work: The Cultural Contingency of Social Capital in Chinese High-tech Firm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Vol. 52, No. 1(2007), pp. 1 - 31.
- [8] 康晓光、韩恒:《分类控制: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6期,第73-89页。[Kang Xiaoguang & Han Heng, "The System of Differential Controls: A Study of the State-Society Relationship in Contemporary China," *Sociological Research*, No. 6(2005), pp. 73 - 89.]
- [9] 唐文玉、马西恒:《去政治化的自主性:民办社会组织的生存策略》,《浙江社会科学》2011年第10期,第58-65页。[Tang Wenyu & Ma Xiheng, "Depoliticized Autonomy and Survival Strategy of Civilian-Run Social Organization: A Case of Non-Profit Incubator," *Zhejiang Social Sciences*, No. 10(2011), pp. 58 - 65.]
- [10] 俞可平:《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论要》,《孔子研究》1989年第2期,第24-31页。[Yu Keping, "Chinese Traditional Political Comment," *Confucius Research*, No. 2(1989), pp. 24 - 31.]
- [11] [澳]乔纳森·安格:《中国的社会团体、公民社会和国家组合主义:有争议的领域》,刘庆军、王尧译,《开放时代》2009年第11期,第133-140页。[J. Unger, "Chinese Social Organizations, Civil Society and State Corporatism: A Disputed Area," trans. by Liu Qingjun & Wang Yao, *Open Era*, No. 11(2009), pp. 133 - 140.]
- [12] N. M. Somma, "How Do Voluntary Organizations Foster Protest? The Role of Organizational Involvement on Individual Protest Participation," *Sociological Quarterly*, Vol. 51, No. 3(2010), pp. 384 - 407.
- [13] D. McAdam & R. Paulsen, "Specify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Ties and Activism,"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99, No. 3(1993), pp. 640 - 667.
- [14] A. Melucci, *Challenging Cod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 [15] M. R. Somers, "Narrativity, Narrative Identity, and Social Action: Rethinking English Working Class Formation," *Social Science History*, Vol. 16, No. 4(1992), pp. 591 - 630.
- [16] D. A. Snow, E. B. Rochford & S. K. Worden et al., "Frame Alignment Processes, Micromobilization, and Movement Particip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51, No. 4(1986), pp. 464 - 481.
- [17]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trans. by Dong Guoliang,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8.]
- [18] [英]罗伯特·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王列、赖海榕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R. D. Putnam,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trans. by Wang Lie & Lai Hairong, Nanchang: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1.]
- [19] D. McAdam, "Recruitment to High Risk Activism: The Case of Freedom Summer,"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92, No. 1(1986), pp. 64 - 90.
- [20] D. McAdam, *Political Proc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lack Insurgency, 1930 - 197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 [21] A. D. Morris, *The Origins of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New York: Free Press, 1984.
- [22] S. M. Lipset & S. S. Wolin, *The Berkeley Student Revolt: Facts and Interpretations*,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65.
- [23] S. Verba, K. L. Schlozman & H. Brady et al., "Race, Ethnicity and Political Resources: Particip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23, No. 4(1993), pp. 453 - 497.
- [24] J. Gerhards & D. Rucht, "Mesomobilization: Organizing and Framing in Two Protest Campaigns in West German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98, No. 3(1992), pp. 555 - 596.

- [25] D. Yang, "Civil Society as an Analytic Lens for Contemporary China,"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 2, No. 1(2004), pp. 1 - 27.
- [26] 王颖、折晓叶、孙炳耀:《社会中间层:改革与中国的社团组织》,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3年。[Wang Ying, Zhe Xiaoye & Sun Bingyao, *Social Intermediary: Reform and Chinese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Beijing: Chinese Development Press, 1993.]
- [27] 熊易寒:《社区选举:在政治冷漠与高投票率之间》,《社会》2008年第3期,第180-204页。[Xiong Yihan, "The Paradox of Urban Community Elections between Political Apathy and High Rates," *Society*, No. 3 (2008), pp. 180 - 204.]
- [28] 孙秀林:《村庄民主及其影响因素:一项基于400个村庄的实证分析》,《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6期,第80-106页。[Sun Xiulin, "Rural Democracy and Its Impact Factors: An Empirical Research Based on 400 Villages," *Sociological Research*, No. 6(2008), pp. 80 - 106.]
- [29] 胡荣:《社会资本与城市居民的政治参与》,《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5期,第142-159页。[Hu Rong, "Social Capital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Urban Residents," *Sociological Research*, No. 5(2008), pp. 142 - 159.]
- [30] [美]贝尔特·克兰德尔曼斯:《抗议的社会建构和多组织场域》,见[美]艾尔东·莫里斯、卡洛尔·麦克拉吉·缪勒主编:《社会运动理论的前沿领域》,刘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90-120页。[B. Klandermans,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rotest and Multi-organizational Fields" in A. D. Morris & K. M. Miller(eds.), *The Frontier of Social Movement Theory*, trans. by Liu Neng,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90 - 120.]
- [31] S. Moscovici, "The Phenomenon of Social Representations," in R. M. Farr & S. Moscovici(eds.), *Social Represent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3 - 69.
- [32] A. Oberschall, "The 1960s Sit-ins: Protest Diffusion and Movement Take-off," *Research in Social Movements, Conflict and Change*, Vol. 11, No. 1(1989), pp. 31 - 53.
- [33] A. Wildavsky, "Choosing Preferences by Constructing Institutions: A Cultural Theory of Preference Formation,"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1, No. 1(1987), pp. 3 - 22.
- [34] [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西德尼·维巴:《公民文化——五国的政治态度和民主》,马殿军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G. A. Almond & S. Verba, *Civic Culture: Political Attitude and Democracy in Five Countries*, trans. by Ma Dianjun et al., Hangzhou: 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89.]
- [35] 陶建钟:《公民身份、公民文化与公民教育——一种民主与国家理论的共治》,《浙江学刊》2009年第3期,第98-102页。[Tao Jianzhong, "Citizenship, Civic Culture and Citizen Education: Integration between Democracy and State Theory," *Zhejiang Journal*, No. 3(2009), pp. 98 - 102.]
- [36] H. Kuan & S. Lau, "Traditional Orientations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Three Chinese Societie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11, No. 31(2002), pp. 297 - 318.
- [37] [美]戴波拉·弗里德曼、道格·麦克亚当:《集体认同感和行动主义:网络、选择和集体行动的生命历程》,见[美]艾尔东·莫里斯、卡洛尔·麦克拉吉·缪勒主编:《社会运动理论的前沿领域》,刘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77-195页。[D. Friedman & D. McAdam, "Collective Identity and Activism: Networks, Choices, and The Life of a Social Movement," in A. D. Morris & K. M. Miller(eds.), *The Frontier of Social Movement Theory*, trans. by Liu Neng,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177 - 195.]
- [38] 黄光国:《人情与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见黄光国编:《中国人的权力游戏》,台北:远流图书公司,1988年,第7-55页。[Huang Guoguang, "Favor and Face: Power Game of Chinese," in Huang Guoguang(ed.), *Power Game of Chinese*, Taipei: Juliu Book Company, 1988, pp. 7 - 55.]
- [39] 孙立平、郭于华:《“软硬兼施”: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作的过程分析》,见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编:《清华社会学评论特辑1》,厦门:鹭江出版社,2000年,第21-27页。[Sun Liping & Guo Yuhua, "Carrot and Stick: Informal Operation of Formal Authority," i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of Tsinghua University (ed.), *Tsinghua Sociological Review(Special 1)*, Xiamen: Lujiang Publishing House, 2000, pp. 21 - 27.]

- [40] 桂勇:《邻里政治:城市基层的权力操作策略与国家-社会的粘连模式》,《社会》2007年第6期,第102-126页。[Gui Yong, "Neighborhood Politics: Urban Grassroots Power Operating Strategy and the State-Society Conglutination," *Society*, No. 6(2007), pp. 102 - 126.]
- [41] 田先红:《农民行动单位与上访行为逻辑的区域差异——一个解释模型》,《人文杂志》2012年第4期,第163-171页。[Tian Xianhong,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between Peasants Action Unit and Petition Behavior: An Interpretation Model," *The Journal of Humanities*, No. 4(2012), pp. 163 - 171.]
- [42] 于建嵘:《农民有组织抗争及其政治风险》,《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3期,第1-16页。[Yu Jianrong, "Peasants Organized Protests and Political Risk," *Strategy and Management*, No. 3(2003), pp. 1 - 16.]
- [43] [美]迈克尔·罗斯金、罗伯特·科德、詹姆斯·梅代罗斯等:《政治科学》,林震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M. Ruskin, R. Cordery & J. Medeiros et al., *Political Science*, trans. by Lin Zhen et al., Beijing: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2001.]
- [44] 罗爱武:《公民自愿主义、社会资本与村民投票参与》,《社会科学论坛》2011年第7期,第191-203页。[Luo Aiwu, "Citizens Voluntarism, Social Capital and the Voting Participation of Villagers," *Tribune of Social Sciences*, No. 7(2011), pp. 191 - 203.]
- [45] 于建嵘:《当前农民维权活动的一个解释框架》,《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2期,第49-55页。[Yu Jianrong, "The Framework of Interpretation for Political Reforms in Rural China," *Sociological Research*, No. 2(2004), pp. 49 - 55.]
- [46] [德]托马斯·海贝勒:《自上而下建立公民社会结构?》,宾建成译,《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年第6期,第117-126页。[T. Heberer, "The Civil Society Structure is Established from Top to Bottom?" *Comparative Economic and Social Systems*, trans. by Bin Jiancheng, No. 6(2010), pp. 117 - 126.]
- [47] L. Nir, "Ambivalent Social Networks and Their Consequences for Particip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Vol. 17, No. 4(2005), pp. 422 - 442.
- [48] G. Guo, "Organizational Involvement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China,"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40, No. 4(2007), pp. 457 - 482.
- [49] 周雪光、艾云:《多重逻辑下的制度变迁:一个分析框架》,《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第117-126页。[Zhou Xueguang & Ai Yun, "Multiple Logics in Institutional Change: Toward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No. 4(2010), pp. 117 - 126.]
- [50] 李怀印:《华北村治: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国家与乡村》,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Li Huaiyin, *Rural Governance in North China: The State and Villag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8.]
- [51] 黄宗智:《集权的简约治理——中国以准官员和纠纷解决为主的半正式基层行政》,《开放时代》2008年第2期,第10-29页。[Huang Zongzhi, "Centralized Minimalism: Semiformal Governance by Quasi-Officials and Dispute Resolution in China," *Open Era*, No. 2(2008), pp. 10 - 29.]
- [52] [美]塞缪尔·P.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S. P.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trans. by Wang Guanhua & Liu Wei et al.,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89.]
- [53] 张静:《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Zhang Jing, *Grass-roots Government: The Rural System Problem*,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7.]
- [54] M. Granovetter,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91, No. 3(1985), pp. 481 - 510.
- [55] R. V. Gould, "Multiple Networks and Mobilization in the Paris Commun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56, No. 6(1991), pp. 716 - 729.
- [56] 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Fei Xiaotong, *Rural China*,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7.]

